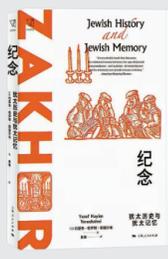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从温暖的希腊海岛到寒冷的冰岛,作者足迹遍布整个欧洲大陆,深入史诗故事的发生地,深刻感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

《史诗大陆:欧洲历史的血与火》
[英]尼古拉斯·朱伯 著
马泽民 谭年琼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本书是研究集体记忆问题的思想史名著,写给所有对历史、民族、集体记忆之间的模糊关系感到好奇的人——无论是不是犹太人。

《纪念: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
[美]约瑟夫·哈伊姆·耶路沙米 著
黄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客观、全面地反映顾维钧的一生,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形象。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金光耀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这是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平等对话之作。与桑德尔的相遇,为我们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提供了契机。

《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
[美]迈克尔·桑德尔蒙 著
朱慧玲 贾沛楠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出版



作者认为,魏晋名士的所谓“风流”,只是一种精心且刻意的营造,目的是借此获得更佳的社会性利益,如声誉、地位、官阶等。本书基于《世说新语》文本而作出别样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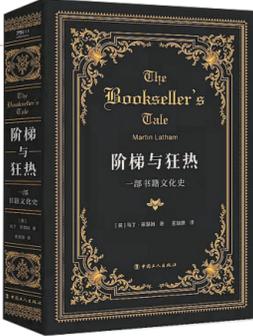
《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
董铁柱 著
中华书局
2022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从图书史中贴近人类的情感与历史

赵瑜

关于图书的文史,之前我看过翁贝托·艾柯所著《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因为艾柯本人便是藏书家,所以他对图书的进化史很是熟悉。在这部作品中,艾柯将人类的阅读和记忆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矿物时代,就是人类将经历过的事情刻在石头上,给后世的人作一个提醒。这就是至今保留在世界上的岩画或石窟中的壁画。而自从人类发明用植物制作纸张,人类的记忆便可以记录在纸上,而纸更易保存。艾柯将这种记忆称为“植物的记忆”。正因为有了植物的记忆——图书,人类的进化便越来越快。因为,一代人活着的经验得以记录,那么,后世的人们可以避免重复上代人犯下的错误。



《阶梯与狂热》
马丁·莱瑟姆 著 王喆源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中国书业史》
郑士德 郑北星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是被禁止读书的

与艾柯相比较,英国书商马丁·莱瑟姆的《阶梯与狂热》更偏向于图书的佚事,读来非常有趣。

比如,莱瑟姆用很大篇幅来叙述读书所带来的情感震颤,比如很多人读书时痛哭的故事。狄更斯给他的弟媳写信时说,有人在读他的《董贝父子》时大哭起来,毫不掩饰,激动得浑身发抖。塞缪尔·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出版以后,更是看哭了数万读者。1852年,一位年老的苏格兰医生给作者理查森写信说,读他的这部小说哭得吃不了饭。而伟大的托尔斯泰竟然也有读书时读哭的时候,他是读普希金诗的时候被感动了,哭得像婴儿一样。

一个小道士卖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半数藏书

在《阶梯与狂热》中,莱瑟姆用一个完整的章节写了道士王圆箓,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不起眼的小道士,几乎是中国最大的文物贩卖者。他一个人卖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半数藏书。

莱瑟姆笔下的王道士,在1890年代是乞讨者。一天,王道士来到莫高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莱瑟姆这样写王道士的选择:

王道士参观这里时,这些寺庙状态不佳,因此他自愿献身成为这里的保护者。他清除了一些石窟里填满的沙漠沙子,修复壁画,甚至委托别人绘制新壁画。他常常用尽布施与乞讨,但现在这些钱财只有一个用途——石窟。

这段文字至少说明,在没有发现藏经洞之前,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者。直到有一天,王道士在修复一幅壁画时,发现壁画的后面应该是空的。莱瑟姆写道:

他破墙而入,在他那盏小油灯的昏暗光线下,他看到另一个约2.7米见方

的山洞,里面堆着约3米高的卷轴。这项考古发现与霍华德·卡特进入图坦卡蒙陵墓不相上下,这些卷轴可以追溯到4世纪到11世纪。王道士多次试图引起当地官员对这个藏经洞的兴趣,但他们兴致缺缺,只是让他看守石窟。

王道士最初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字中,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余秋雨对王道士是痛心疾首的。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王道士并不懂得这个藏经洞中书的价值。他一直在向当地的衙门汇报这件事情,结果,他一次次地去,步行几十几百公里,却一次次地被打发回来。最好笑的是,王道士赶着毛驴,冒着被沙漠中的狼吃掉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找到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延栋。这位延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

这才有了王道士向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出卖经书的事情。

斯坦因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金刚经》的刻板印刷的版本,这一下让全世界知道了,是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金刚经》除了让王道士出名以外,还让唐代一位叫王玠的刻字工匠出了名。因为,在斯坦因购买的《金刚经》印刷版上,竟然留有王玠的名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这差不多是向世界宣告,至少在唐或者更早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刻板印刷的技术。

莱瑟姆笔下的中国早期印刷的佛经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本佛经印刷前都有人许愿。在莱瑟姆的笔下,赞助印刷佛经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愿望:

一卷是一个农民为他的牛许愿获得更好的转世,另一卷是一位女性希望

一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史

与《阶梯与狂热》这部图书野史相对照,我近期刚好阅读了《中国书业史》(上下)两卷本。打开目录,我直奔唐代的《千字文》。与莱瑟姆的书写相对应的是,《中国书业史》不仅有考证,还有更为细节的举例。

在唐代,中国的乡村识字教材,是《千字文》。《中国书业史》这样写道:

唐代女诗人薛涛居于成都浣花溪,与客人饮酒,行《千字文》令。在敦煌石室藏有许多从唐代至五代的《千字文》写本,仅被外国人斯坦因、伯希和劫至西方的就达31种。

《中国书业史》是关于图书出版的史,然而,这部作品中的引文也非常有趣。

比如唐代开书店很有名的徐文远是河南洛阳人,徐文远和他的哥哥徐文林在长安城开了一个书店。一边开书店,徐文远还一边开设学馆讲学。徐文远教出来的有名的学生李密,后来造反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唐代的书肆,因为皇帝李世民喜欢书法,所以,书店大多代售书法作品。这就法要求书店老板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在《中国书业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唐代人李肇著《尚书故实》载:“京师书肆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善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这条史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唐代书肆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第一,孙盈办的这家书肆,经营有方,远近闻名;第二,这家书肆不仅卖书,也卖名家书法字帖、字画和名画家的画卷;第三,这些书画多出自前朝名家手笔,价格很高,十分珍贵,有人就加以临摹仿制,以假充真骗取买主的钱财,书肆经营这类书画精品必须是行家手里……

从这一段文字来看,唐代的书店和现在的书店形态几乎一样,只是更多了一些古玩字画,就像是民国时期的旧书店。

如果说,《阶梯与狂热》是一部轻松的关于图书的奇闻博物馆,那么,《中国书业史》差不多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史。在手机资讯过度供给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安静地阅读纸质图书的时间,而《阶梯与狂热》和《中国书业史》中所介绍的图书目录,足以支撑我们很长时间的阅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样的图书中找到更多的书目来。

逃离荒芜沙漠回到国都,还有一卷是一名官员为了升官……

爬梳剔抉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
张剑 主编
凤凰出版社出版

日记作为热门的史料、图书市场的重要门类,已成为学界研究靓丽增长点。据知网所示,仅2021年1月至10月,就有超过60篇专门研究近代日记的文章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新近出版的《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共收论文18篇,集中研究日记16部(其中一部为日本僧人所撰),时间跨度从宋代直至民国,研究方法涵盖文献考订、文学书写、心态分析、阅读史等,显示了日记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议题,并为探讨日记研究的新方法提供了启示。

重返文献学的日记研究

书中不少论文注意文献考订与对读。例如,同是从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入手,《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见之北宋运河》分析北宋运河管理和日常生活,并将其与其他宋人旅行日记进行比较,细致描绘北宋运河的路线、生活空间及运河景观等。而《王安石复赴汴日程与〈泊船瓜洲〉系年补》则巧妙利用《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北宋运河行程,在枯燥的道路里程记载中,提炼有价值史料,从而佐证王安石可能“借道赴阙”,其行程之速应当借助于宰相的权力,进而为《泊船瓜洲》一诗的系年提供新证。

日记勾勒是尚待拓展的领域。记录个人事务较精确的日记,在记载人名、地名等信息时则稍显随意,故颇有谬误。《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见之北宋运河》即指出日记所载汴河沿岸信息之误,将“新泽镇”误为“寄宅镇”等。仅据日记诸版本校勘,往往不易察觉此类谬误,此时,须借助史志等材料综合校勘。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所收多篇文章,都注意运用文献学方法解决具体问题。这表明,对日记这样的“新材料”而言,传统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手艺”仍是研究的重要手段。在新方法热的时下,回归文献学的“笨功夫”,不仅有助于夯实日记研究的基础,还能切实开拓新的议题。

日记研究的新动向新议题

孝胥的出处与心态,将历史事件与个人生命的重要时刻相结合,管中窥豹,见出丁未年是郑孝胥政治生涯与人生态度的“关键年份”。由此可见,从文史两翼研究日记略有差异,文学研究者往往注意日记的书写问题,史学研究者则重视日记时代背景。若两者结合,则日记研究的新方法提供了启示。

此外,日记研究的两翼,均强调一种“过程”的推演。无论是心态史研究还是思想史或阅读史的梳理,都将研究对象视作动态的,故每每试图厘清其发展脉络,这有助于从长时段厘清其发展脉络,清晰见出其兴盛寂灭的全景。当然,需注意的是,若“过程”性的描述无法得出差异性的结论,则研究可能陷入“新瓶装旧酒”的窘境。

一种可能:从“有什么”到“是什么”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为探讨日记研究方法提供诸多启示,为研究“日记有什么”这类问题提供了十八般武器,开后学以方法之门。且由于其开拓性,在回答“日记是什么”这一大问时,也开了许多话头,值得继续推进。

日记究竟是作者精心描绘的产物,还是自我写作的“实录”?本书相关论题利用洪亮吉《遣戍伊犁日记》、王韬《蘅华馆日记》等,探讨作者的自我形象构建,颇予人以启发。

然笔者尚有疑问:日记作者在相对私密的写作空间中,孜孜矻矻塑造自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洪亮吉与王韬等人写日记并非旨在刊刻,何以如此细致营造?笔者以为,所谓日记的“自我塑造”问题是今人强加给古人的虚构意识。对日记作者而言,他只是写自己的日常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至于将何者剪裁进日记,不过是彼时彼刻其内心所想的忠实记载,即日记作者无意于“塑造”自我。此处触及日记写作动因及文体特质的探讨,日记为何而写,所写为何?是对外界的宣泄,还是内省的记录?

以往的日记研究多呈现为“有什么”的模式,即研究者致力于攫取日记中的某类材料,作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分析,日记由此沦为工具性史料。这类研究掩盖了史料存在形式的广泛性问题,即日记所提供的史料往往并非唯一。那么,推动某项研究是否必须借助于日记?换言之,“有什么”类型的研究仅揭示日记中蕴藏某些史料,至于这些史料是否是论述某类问题的关键材料,许多研究考虑不足。如果日记中的某类史料仅是众多研究该问题的史料之一,而非唯一和价值较高的,那么,此类“日记有什么”的研究是否必要?

笔者认为,日记研究应在“有什么”的研究外,复返到“是什么”的基础性问题。推动“日记是什么”的研究,需回归文献学的耐心,需兼具文史研究的长处,也需准确把握日记的传统和体例,如对日记书写的原则、日记与日记作者的关系等问题有清晰认识。对于“有什么”的问题,当前的日记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对于“是什么”的问题,《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掀开了一个豁口。

三味书屋



《数据如何误导了我们:普通人的统计学思维启蒙书》
[荷]桑内·布劳著 冯皓璐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比数据更重要的是解读数据

王贺

许多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同行,坚定地信奉数据作为研究证据的威力,但正如技术并不是中立的,数据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客观。必须承认,从数据标准化,到采集、清洗,再到分析、讨论,每一阶段都充满人为的、主观的因素。另一方面,正如学者所指出,尽管统计学家和计算机软件专家把统计分析变得不那么深,“他们的聪明才智使用户可以满足于在理论思维上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却不需要在数理上知其然,当然更谈不上知其所以然。”(李连江《戏说统计:文科生的量化方法》)那么,作为用户,我们该如何穿越数据迷雾,“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解读和正确、理性的认识?

其实,概述统计学原理及其与日常生活之关系,以此拆解“数据主义”迷思,免使我们沦为数据奴隶的同类型书籍,此前国内已出版不少。除极少数为国人所著,绝大多数为引进的外国学者著作。诸如《女士品茶:统计学如何变革了科学和生活》(2016)、《数据的真相:如何在数字时代做出明智决策》(2018)、《大数据时代的统计学思维:让你从众多数据中找到真相》(2018)、《错觉:AI如何通过数据挖掘误导我们》(2019)、《大数据:挖掘数据背后的真相》(2020)等,各有其长处与不足。概括地说,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较艰深,非得有一定基础才能读,有的举例太多、理论说明较少,有的实用性尚可存疑。

桑内·布劳的《数据如何误导了我们:普通人的统计学思维启蒙书》,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大数据分析的发展历史及相关概念,支撑大数据分析的统计学基础知识,揭示了数据的常见错误、滥用和陷阱——很大程度上,要由研究人员的直觉、认知偏差和利益关联等负责,还向我们给出了面对数据时不必头晕目眩而可提出若干质疑及由此可形成的一整套数据批评标准、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使用数据,并在日常生活与学术领域发展出可能的、适合自己的

的数据抵抗、应对策略。由此,作者成功地实现了要“写一本适合所有人看的书”的目标。

毋庸讳言,该书也有其局限。无论全书架构还是章节,乍看都有“耸人听闻”的题目,正文的具体论述亦有可供商榷之处。如在论及大数据分析的历史时,侧重于其起源,即以南丁格尔对英国军队护理情况的收集、分析及可视化为代表,随着“民族国家”在19世纪的出现,现代官僚政治的发展,全人类迎来了广泛使用数据的时代,而较少论其流,尤其互联网诞生之后的变革,互联网头部企业不断创新的数据分析商业战略等问题;又如论及“人们口中的算法到底是什么”时,仅举例说明算法可能被误用、滥用,却未分析目前常见、相对发展较成熟的算法类型,更未从技术层面简要讨论其各自之优劣,使人读来略感不足。

但世上岂有尽善尽美之书。正如《洪业传》中所言:“书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好的坏的都有;就像有人摆了一桌筵席给你吃,你应该拣爱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古书的语言换了几次,所以看的时候要拣好的记着,其余的不要。里面的错误、前后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但有些看起来像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后发现并不矛盾;但你专心去记那些,等于

白费脑筋。”这一说法的要点,即善学者当学人之长,而大致适用于读近人、今人书及东洋、西洋书,甚至报章杂志、新媒体内容等一切读物。当然,严格说来,洪先生的这一认识亦非其独创,其实贯穿于自《吕氏春秋》以降的中国古代学人的阅读实践和理论传统之中。

另外,布劳和上举诸书有一共同之处,也不可不提。简言之,这些著作首先都提醒我们(无论是作为数据消费者,还是采集者、研究者,抑或是被采集的对象),虽身处大数据时代,但不必对数据迷信、崇拜,更不必向其俯首称臣,以全盘托出自己的隐私、让渡个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换取某些短期内“有益”但从长期看来将危害无穷的“好处”,如对那些肆意窃取用户隐私的App坚决说不,警惕那些以各种名义出现的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其次,与采集、整理数据和数据可视化等工作相比,甚至是与数据本身相比,正确地解读、利用数据才是更重要的。而这一点,不仅是相信人文学术的一切议题皆可精确测量、计算(真的可能吗?)的“数字人文”研究需要注意的,也是数据科学领域、大数据相关领域都需要共同面对的,甚至可以说,还是今时今日普通公民应具备的核心“数字读写能力”或谓“数据素养”之一。